

被誉为『兵工泰斗』的刘鼎

□ 宋庆伟

刘鼎 1903 年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浙江高等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机电专业毕业，1923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 年留德勤工俭学主攻机电专业，同年经孙炳文、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技术和兵器原理，1930 年回国后战斗在党的隐秘战线上，1933 年进入苏区后开启了长达 50 余年的兵工生涯，为人民兵工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奋战一生。

苏区时期造出人民兵工的第一批火炮

1930 年刘鼎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央特科情报科工作。1933 年春，刘鼎由上海前往中央苏区。途经闽浙赣苏区时，因方志敏挽留并经中央批准，刘鼎出任闽浙赣苏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红军第五分校政委，并为五分校学员讲授《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等课程。除政治工作外，

刘鼎还十分重视军事技术的改进，先后创建了电话通讯班和旗语训练班，受到方志敏的高度赞扬。

因前方作战缺乏重武器，方志敏专门找到刘鼎，让他去兵工厂制造小钢炮，以摧毁敌军碉堡。刘鼎受命到洋源兵工厂任政委后，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改进了黑火药的配方，缩小了弹壳直径，增强了手榴弹的爆炸威力。刘鼎还重新翻阅苏联学习时的《炮击炮学》，自己绘制图纸，利用手摇车床和简陋的翻砂设备，制造了 3 门 35mm 口径的小迫击炮及炮弹。这是兵工史上我军制造的第一批火炮。对于洋源兵工厂建设的成绩，方志敏在自己的狱中遗著中有过专门描述：我们的兵工厂加紧工作，子弹比以前增加百分之三百，手榴弹增加百分之五百，迫击炮弹改良了，而且还多造百分之四百多。甚至连小钢炮都造出来了，他们第一次试炮时，轰的一声平射出去，打进土内三尺多。

抗战时期开创太行兵工的鼎盛时期

1937 年 3 月，刘鼎在中央的指示下创办了延安摩托学校，后又担任抗大政治主任教员，并兼任中央党校马列主义教员。1940 年 4 月，经朱德提名，刘鼎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彭德怀、左权、杨立三送刘鼎赴任。刘鼎到任后，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推动太行兵工进入了鼎盛时期。

在技术攻关方面，刘鼎借鉴“捷克式”“三八式”“老套筒”“汉阳造”等步枪的优势，绘制了“八一式步马枪”，推动了步枪的制式化生产；组织工程师攻克了白口生铁的烟火技术，试制了总部第一批 50mm 迫击炮及炮弹；指导学化学出身的白英、王化南等人先后试制了硫酸、硝酸、硝化甘油和硝酸炸药，结束了人民兵工只能使用黑火药的历史，极大地提升了炮弹和手榴弹的杀伤半径；编印《地雷制造使用法》《各种地雷触发装置法》，创办地雷训练班，掀起了“村村造地雷，户户有地雷”的爆破运动。

在工厂管理方面，刘鼎先后制定推行了兵工厂的“政治学习制度”“工会制度”“经济核算制度”“绩效工资制度”“工务制度”等，推动了太行兵工的制度化发展。在人才培养方面，刘鼎创办太行工业学校（山西中北大学前身），设立机械班、化工班、矿冶班、工会干部班、政工干部班等，把政治学习与技术学习统一起来，为人民兵工培养了一批又红又专的骨干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造炮弹、“土飞机”

抗战胜利后，刘鼎受中央委派，带领兵工骨干到东北筹建兵工基地，因道路受阻，后留在晋察冀军区工作。1946 年 11 月，刘鼎出任晋察冀边区工业局副局长，并加紧开展对旧式兵工厂的接收工作，整编和组建新的兵工厂。为配合城市攻坚战

展，刘鼎组织沈鸿等人试制了 46 式瞬发引信，极大地提高了 82mm 迫击炮弹的射程和杀伤力。同时，刘鼎按中央军委指示，将晋察冀军区兵工生产的重点转移到炮弹和炸药包的生产上，主攻 82mm 和 120mm 加重迫击炮弹、60mm 长杆大头弹、圆盘药包弹等产品。

为满足炸毁敌军碉堡和城墙的需要，刘鼎加紧了对黄色炸药包投掷器的研制。刘鼎组织人员利用去掉头部的氧气瓶或汽油桶，并加装方向控制与俯仰机制以调整射击角度，其炮弹系大口径迫击炮弹，加装 10 公斤炸药，大大增加了炮弹的爆炸威力。黄色炸药包投掷器既能城市攻坚，又能大范围杀伤敌人，具有了轰炸效果，被毛泽东称赞为“土飞机”。据淮海战役目击者回忆，很多敌人不是被炮弹碎片打死的，而是被炸药包的气浪冲击致死或烧死的，可见其威力巨大。1948 年，刘鼎被任命为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副部长，并在华北解放区推广黄色炸药包投掷器的批量生产，极大提升了解放军的炮火威力和数量，推动了战局的迅速转变。

构思新中国兵工建设的第一张蓝图

新中国成立后，刘鼎被中央任命为重工业部副部长，分管兵工、机器、汽车、船舶及电信等工业。到任之初，刘鼎先后到东北、华北、华东、重庆等地考察接收兵工厂和重工业的具体情况。在此基础上，刘鼎与杨立三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包括中国制式武器系列型谱、建立兵工科研院所和学校、更新兵器工业生产大纲、改造兵工生产技术条件等在内的书面建议。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刘鼎根据美军作战特点，研制了 57mm 无后坐力炮及炮弹、90mm 火箭筒及火箭弹、反坦克手榴弹及地雷等新式武器，极大提高了志愿军的对敌杀伤能力。1951 年 5 月，刘鼎参加以徐向前为团长的中国兵工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对苏联的兵工建设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回国后，刘鼎制定了《现有工厂调整大纲》《五年新建工厂大纲》等兵工建设计划，并上报中央军委。1952 年 5 月，中央在刘鼎上述报告的基础上，制定并通过了《关于兵工问题的决定》，确定了我国第一批 18 种制式化武器型谱，批准了 41 个兵工厂调整为 38 个的方案，同意 5 年内新建 9 个短线、缺门兵工厂的计划。可以说，刘鼎在广泛、深入的国内外调研基础上构思了新中国兵工建设的第一张蓝图。

此后，随着国务院机构调整，刘鼎先后担任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航空工业部常务副部长等职，继续奋战在兵工战线上。1986 年 7 月 25 日，刘鼎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 83 岁。习仲勋为其题词：兵工泰斗，统战功臣。



“青红”携手震撼浙西南——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碑碑文敬读

□ 王香花



在浙江省松阳县安民乡安岱后村，矗立着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碑，由中共松阳县委、县人民政府于 2015 年时逢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 80 周年之际建树。碑座周围四组浮雕展现挺进师在松阳的重要事件场景。正面镌刻“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碑”，背面刻有碑文，全文如下：

安岱后地处闽、浙、赣边界的浙江西南部，此处崇山峻岭，古木参天，万顷猴头杜鹃堪称华东一绝。村后箬寮岬为松阳最高峰，凭岫可眺松、遂、云、龙四县市。当年，陈凤生、陈丹山与卢子敬曾统率五千“青帮”民众暴动达四县，震撼浙西南。一九三五年五月，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刘英、粟裕的率领下，几经转折进入浙西南，依托安岱后战略要地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建立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青帮”民众拥戴红军，“青红”携手联合，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活动。大批“青帮”骨干入党参军，扩大红军队伍。根据地内成立了区乡村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农民游击队和团妇等群众组织。在随后的反“围剿”与突围战斗中，坚守根据地的第五纵队，作战勇敢，不怕牺牲，被誉为第一支浙西南人民子弟兵，他们为根据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青山埋忠骨，热土树丰碑。安岱后因其特殊位置、经历和人物而成为人们敬仰之地。二〇〇〇年以来，县委县政府和有关单位援助款项修缮安岱后革命遗址，并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继承发扬革命传统，激励吾辈后人。故立此碑，铭记隽永。

碑文记述了挺进师进入松阳，与当地农民武装“青帮”联合开辟保卫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历程，第五纵队和地方游击队不怕牺牲，勇于献身，掩护主力部队突围，保留革命火种。敬读碑文，眼前浮现当年的战斗场景，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之情油然而生。

“三迎红军”：挺进师打开浙西南革命新局面的钥匙

1935 年 5 月 10 日，红军挺进师主力在刘英、粟裕率领下，经过千里转战进入松阳西南边界。下午，浙西南农军首领陈凤生、副首领陈丹山在安岱后外垵寺岭头迎候；11 日上午，农军副首领卢子敬率领 38 名农军战士和学生举着红绿彩旗，敲锣打鼓在水店外幕寮列队欢迎；下午，在斗潭永福寺，“一卢二陈”召开欢迎红军大会，喊出“青（“青帮”即农军）红（军）一句话，永世不分家”的口号，并由此形成“青红”大联合，军民合作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良好局面，史称“三迎红军”。

“三迎红军”结束了挺进师自 1934 年 7 月以来离开中央苏区，先是北上先遣，后又东突挺进，转战几千里，一直处在被敌人前堵后追、极其艰难困苦的境地，挽救了生死存亡危急关头的挺进师，从而使挺进师找到了可靠的立足之地，许多贫苦农民特别是“青帮”骨干闻讯，迅速加入共产党和挺进师，革命力量顿然壮大，为掀起浙西南革命风暴奠定群众基础。

小吉会议：挺进师创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转折

“三迎红军”后，挺进师坚持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在运动中攻击重镇、除霸安民、开仓济贫，恶霸、劣绅、不法地主富农、作恶多端的乡绅长威风全无，贫苦百姓衷心拥护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民众参加革命热情高涨，在浙西南创建革命根据地条件基本成熟。师首长决定召开最高领导机构会议——师政治委员会会议，商讨、部署根据地全面建设大计。

6 月上旬，师政治委员会会议在松阳县西南边境小吉村召开（又称“小吉会议”）。刘英、粟裕等师政治委员会成员出席会议，各纵队政治委员、纵队长、师直各部门负责人和松遂龙地方武装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由师政治委员刘英主持。会议成立了中共浙西南特委、浙西南军分区、松（阳）遂（昌）游击大队、挺进师独立第 15 支队、浙西南地方政治工作团。会议决定：以建立农村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农会组织为前提，以土地革

命为中心内容，尽快建成中央苏区式的革命根据地。同时，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以有效的武装保卫革命根据地建设顺利进行。

小吉会议后，各部队任务明确，士气大振。主力部队外线出击，在浙西南基本区域内，农村党组织、政权组织和各种群众组织蓬勃发展，土地革命轰轰烈烈，游击战争节节胜利，迅速形成一个以安岱后、住溪、王村口三点相倚，纵横松（阳）遂（昌）龙（泉）边境 200 余里的革命根据地，使浙西南革命斗争进入鼎盛时期。小吉会议总结了挺进师进入浙西南腹地一个月来游击战争取得的可喜成绩和存在的差距，制定符合实际的根据地全面建设计划，并召开小组会议进行部署，掀起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全面建设的浪潮。小吉会议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一次从政治、组织、军事上全面部署根据地创建工作的重要会议，在红军挺进师浙西南游击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用鲜血和生命开辟挺进师的突围通道

小吉会议全面部署根据地建设各项任务，实行武装割据，建立党政军群等组织，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成立交通联络情报机构，革命烽火在浙西南迅即成燎原之势。

蓬勃发展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很快引起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恐慌，9 月国民党调集 7 万兵力大举“清剿”浙西南，挺进师采取“敌进我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方针开展反“清剿”斗争。军分区和浙西南特委率挺进师第二、五纵队留守根据地，掩护挺进师主力突围，从而为中国革命保存、输送了一支劲旅，并在日后的抗日疆场、解放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

坚守松阳的挺进师第五纵队尽管组建时间短，但战士们饱受阶级压迫，都有为保卫家乡红色政权和胜利果实而献身的决心，他们坚守根据地，作战英勇，不怕牺牲，为挺进师突围开辟通道，被誉为“第一支浙西南人民子弟兵”。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革命志士在挺进师最艰难的时候，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携手战斗献身革命。至 12 月，在松阳就有 219 名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和地方干部牺牲，201 名地方干部被捕入狱。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践行诺言，把信仰镌刻在这片青山绿水之中，用生命铸就不朽的精神丰碑。



山东抗日根据地包括津浦路以东的山东大部地区和江苏、河北边界的部分地区，是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坚持华北抗战的四大根据地之一，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高度评价山东抗日根据地，称“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成功创建得益于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不断加强。

适时创建省级政权。1937 年 10 月日寇入侵山东后，中共山东省委适时领导全省各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置国家人民于不顾，初战不利即率部南逃，许多专员县长亦携款潜逃。1939 年，国民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新任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等人强占我浴血奋战从日军手中夺回的城镇，杀我抗日将士，限制我党抗日活动，不供应八路军粮款。他们作威作福，鱼肉乡民，有的还与日伪暗中勾结，袭击我军。国民党腐败顽固政权成为抗战的障碍。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加快了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步伐。1940 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选举产生了全省统一的权力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这是中共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省级抗日

民主政权，也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唯一以省为建制的政权。1941 年 8 月，丧失民心的沈鸿烈赴重庆任职，不久后山东省政府主席由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继任。1943 年 7 月，牟中珩率省政府和于学忠部队同时离鲁，移驻安徽阜阳。此后，山东境内已无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和国民党正规部队，中共在山东独撑抗战大局。8 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称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

1944 年底，国民党中央决定由何思源取代牟中珩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可是他一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才来到山东争夺抗战胜利果实。而此时，由于中共始终如一地领导山东军民坚持敌后抗战、推进社会改革和各方面建设，政绩举世共见。所以，山东人民对中共已经产生了如泰山不可拔般的信念信心。1945 年 8 月，在即将出席全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全体山东代表联名建议下，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改名为山东省政府，中共

领导下的第一个省政府诞生。

逐步健全行政机构。全面抗战初期，由于山东党组织对建立民主政权的作用认识不足，对国民党曾“退让太多”，政权建设有些滞后。1939 年，中共中央就加强山东政权建设多次发出指示，山东分局作出了加紧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决定。此后，山东根据地出台县区乡村各级政府组织条例，对县府、区公所、乡公所、村公所

的机构设置、人员配置、任务职权作出明确规定。山东分局设立政府工作部，加强对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统一领导，派出干部到各地组建县乡政权机构。至 1940 年 7 月，山东全省约三分之二的县已经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省级政权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省战工会”）也应时而生。

省战工会成立时，之所以未使用省行政委员会或省政府名称，因为它未经国民政府承认和加委，当时国民政府加委的山东省政府还未逃出山

□ 刘占全

东。为了努力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同时又为了体现推动抗战事业之宗旨，临时使用了这样一个过渡名称。此外，省战工会成立之初的机构设置也较为简单，只包括政治组、军事组、财政经济组、教育组、民运组 5 个工作组，实际就是山东分局的政权部、军事部、财政部、教育部、民众动员部。随着国民党在山东各级政权的垮台和外逃，为了适应抗战和根据地建设需要，中共领导的政权机构不断健全。1941 年 4 月，山东分局撤销政府工作部，将所有民政、财政、经济、地方性武装、国民教育、公安、司法等工作统归省战工会管辖，省战工会各组改为各处，另设公安处和司法处，同时，在省战工会内建立党团组织，以实现党的领导、保证分局之全部政策和一切决定的执行。

1943 年，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称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时，进一步完善了其职权，丰富了其下属机构，增设了工商管理处、调查研究

室和秘书处，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省最高行政领导机关，根据地建设迎来新局面。比如，新设工商管理机构以后，加强了对外贸易管理和边沿地区缉私，有效防止敌人对根据地的物资掠夺，通过对根据地盛产的食盐、花生油等重要物资实行专买专卖、高价输出获得巨大利润，既增加了税收和农民收入，还换回了几十万发子弹和医药、电料等大量根据地必需物资，其在开拓财源、改善民生、支援抗战和对敌经济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深刻改造村级政权。村政权是民主政权的基础，健全村政权是政权建设的基本问题。省战工会作出决定，确定村为政权的基层组织，实行行政村制，设定村民大会、村民代表会议、村行政委员会、村长的关系及其职责，确定了集体领导、分工科学、富有效率的村政工作制度，全部取消便于特务和旧势力统治的保甲制。可是，1942 年春刘少奇来山东指导工作

前，由于村工作中的脱离实际和作风上的粗枝大叶，加之减租减息运动未开展、群众的基本利益没有保障，村民对于政权改造不积极，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村政权 28% 仍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47% 成分严重不纯。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山东党组织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结合，以切实进行减租减息作为发动群众进行村政改造的最好条件，与文化运动中的民主教育、反恶霸斗争、整理村级财政、反贪污等相结合，教育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鼓励群众自觉参与村政改造。同时，按照有关选举办法，各村划分公民小组，灵活采取“豆选”等方式，直接民主选举产生村政人员，让真正代表群众利益、能为老百姓办事的人被选举出来。

经过民主选举，村政权消减了封建势力的影响，基本群众在村政权中的比例大大增加，贫苦农民真正登上了政治舞台，积极参加抗战的广大工农开始执掌村政权。如沂蒙区沂南县村级干部中，贫农占 46.3%，中农占 37%。改造村政与整顿村党支部相结合，加强党员教育，处理少数犯错误党员，总结推广先进支部工作经验，吸收优秀分子入党，合理吸收群众组织的党员负责人为支部成员。村政改造后，村干部素质普遍提高，政权更加巩固，全省涌现出很多掩护党的机关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的模范村。